

王哲人之一

王国维 (1877—1927)，字伯隅，静安，号观堂，浙江海宁盐官镇人。在文学、美学、史学、哲学、古文字学、考古学等方面成就卓著的学术巨匠，国学大师。

章太炎 (1869—1937)，初名学乘，字枚叔，余杭人，后改名为炳麟，浙江会稽人。他提出一个非孔非孟非荀非墨而后人通

钱玄白 (1868—1910)，字鹤卿，又字仲申，民友，子良，乳名阿培，并化名朱紫彭，周子有，中国绍兴山阴人，是

蔡元培 (1868—1940)，字鹤卿，又字仲申，民友，子良，乳名阿培，并化名朱紫彭，周子有，中国绍兴山阴人，是

钱钟书 (1910—1992)，字默存，号槐聚，曾用笔名中书君，中国现代作家、文学研究家，曾为《毛泽东选集》英文版翻译小组成员，与

钱穆 (1894—1990)，字宾四，江苏无锡人，中国现代历史学家、国学家、史学家、文学家、哲学家、散文家、

傅斯年 (1896—1954)，字孟真，山东聊城人，历史学家、文学家、哲学家、国学家、史学家、文学家、哲学家、散文家、

傅斯年 (1896—1954)，字孟真，山东聊城人，历史学家、文学家、哲学家、国学家、史学家、文学家、哲学家、散文家、

傅斯年 (1896—1954)，字孟真，山东聊城人，历史学家、文学家、哲学家、国学家、史学家、文学家、哲学家、散文家、

傅斯年 (1896—1954)，字孟真，山东聊城人，历史学家、文学家、哲学家、国学家、史学家、文学家、哲学家、散文家、

傅斯年 (1896—1954)，字孟真，山东聊城人，历史学家、文学家、哲学家、国学家、史学家、文学家、哲学家、散文家、

傅斯年 (1896—1954)，字孟真，山东聊城人，历史学家、文学家、哲学家、国学家、史学家、文学家、哲学家、散文家、

傅斯年 (1896—1954)，字孟真，山东聊城人，历史学家、文学家、哲学家、国学家、史学家、文学家、哲学家、散文家、

傅斯年 (1896—1954)，字孟真，山东聊城人，历史学家、文学家、哲学家、国学家、史学家、文学家、哲学家、散文家、

傅斯年 (1896—1954)，字孟真，山东聊城人，历史学家、文学家、哲学家、国学家、史学家、文学家、哲学家、散文家、

傅斯年 (1896—1954)，字孟真，山东聊城人，历史学家、文学家、哲学家、国学家、史学家、文学家、哲学家、散文家、

傅斯年 (1896—1954)，字孟真，山东聊城人，历史学家、文学家、哲学家、国学家、史学家、文学家、哲学家、散文家、

陈青之中国教育史(上)

中国学术文化名著文库

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朱希祖

梁启超

梁启超

梁启超

梁启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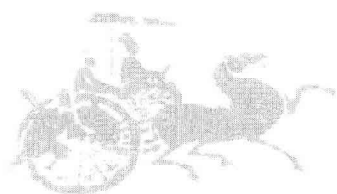
梁启超

梁启超

梁启超

梁启超

梁启超



陈青之
中国教育史(上)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陈青之中国教育史:全2册/陈青之著.

长春:吉林人民出版社,2012.1

(中国学术文化名著文库)

ISBN 978-7-206-08277-1

I. ①陈…

II. ①陈…

III. ①教育史—中国

IV. ①G52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266192号

陈青之中国教育史(上、下)

著 者:陈青之

责任编辑:于二辉 刘 学

制 作:吉林人民出版社图文设计印务中心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(长春市人民大街7548号 邮政编码:130022)

印 刷:北京嘉业印刷厂

开 本:710mm×1000mm 1/16

印 张:53.5 字 数:713千字

标准书号:ISBN 978-7-206-08277-1

版 次:2013年3月第1版 印 次:2013年3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:88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出版说明

一、中国学术文化名著文库，旨在为读者提供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学术精品。当时，学问家经历了新文化运动，西学东渐，学术革新；因时应势而现出版高峰，大师名家之作数量激增，质量上乘，对此时及后世的中国学术发展与演进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

二、本丛书精选此时大师名家之有关学术文化经典著作，以期对20世纪以来的中国学术文化做一系统整理。

三、丛书所收书目，虽各自早有出版，但零散而不成规模。此次汇集，欲为推动中华文化之大发展、大繁荣尽出版人绵薄之力，成一民族文化珍品，为后代留存传之久远的鸿篇巨作。

四、为丛书系列之计，故以史学、国学、文学、一般学术著作之顺序编排。

1. 单种书文字量过少的著作，寻二三种内容相近，或作者为同一名家者，则合成一册，字数以30万字为限；

2. 单种书文字量超过50万字的著作，则分为上、下两册；

3. 单种书文字量超过100万字的著作，则分为上、中、下三册。

五、所收著作，版本不一；流布之中，文字错讹；择其善本，一一折校。现虽为通行横排简体，然尽量保持二三十年代原貌。

1. 人名、地名、异体、通假，仍从原书繁体；

2. 标点符号，从作者习惯，非排版差误者不予改动；
3. “的”，“底”一类文字之分，均从原书；
4. 遇原书字句有疑问者，非有根据不予更改，力求保持原貌。

“中国学术文化名著文库”丛书，工程浩大、环节繁多，编辑、校对、照排、印制人员虽勉力为之然错漏不免，还望方家谅解之余不吝指正。

《中国学术文化名著文库》编委会

主 编：

胡维革（吉林东北亚出版传媒集团总经理

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，博士生导师）

编 委：

赵 毅（辽宁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，博士生导师）

李书源（吉林大学文史学院教授，博士生导师）

程舒伟（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，博士生导师）

张昭军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，博士生导师）

刘信君（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，博士生导师）

执行编委：

杨九屹（吉林人民出版社 编审）

总 序

⋮

在几十年学习和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过程中，我一直对中国近现代的思想文化学术史颇感兴趣。尤其是在1995年至1996年我和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知名教授杜文君老师一起撰著《中国现代文化志》一书时，更是对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学术史进行了认真的梳理和研究。由此，我对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学术史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，尤其是那些文化泰斗、学术大师、扛鼎巨著、思想流派、异说纷争等，更令我铭刻在心，萦绕于怀。直到今天，每每回想起那段英英厉厉、千唱万和的历史，仍然是激动不已。

从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，是中国历史上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，并逐步取得革命胜利的时期。前后两次历史性的开国，前者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，后者标志“中国人民站起来了”。其间38年，是中国社会逐步实现由旧到新的转变时期，与该时期社会经济、政治的变革相适应，中国文化也在古今中西文化的冲突、反思、融合中变革着、发展着：社会文化的结构和内容在更新，西方文化被大量引进，中国传统文化也适应时代变革而被重新阐扬；一些原有学科的内容、体系在变革，许多新的部门文化纷纷兴起；出版了近十万种图书和无以计数的出版物，其中有不少革故鼎新、出类拔萃之作；中等以上学校培养了近五百万名学生，产生了一大批享誉海内外的政治家、思想家、哲学家、文学家、史学家、经济学家、教育家、科学

家，等等。这一时期在文化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，尤其是“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，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。从这时起，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，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”。

现代中国社会的经济和政治，是现代思想文化的源头。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当时中国的根本国情，制约着现代中国文化的主题、结构、性质、内容和特征。“没有资本主义经济，没有资产阶级、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，没有这些阶级的政治力量，所谓新的观念形态，所谓新文化，是无从发生的。”但是从思想文化的相对独立性的角度来考察，中国现代文化是从古代的、近代的文化发展演变而来的。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演变，近代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，社会文化结构的变化，以及知识分子群体的历史走向等，都对现代中国文化的发生、发展有重要的影响。

纵观20世纪初年至1949年中国文化的发展历史，一般以五四运动为界分为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。在“五四”以前，中国文化的基本状况是，由甲午战争后起始的资产阶级文化运动已经开展起来，资产阶级新的文化体系逐渐形成，进化论、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思想成为新文化各个领域的指导思想，而新文化领域各部门也都为宣传民主、自由、平等服务。这时，文化战线上主要是资产阶级新文化与封建主义旧文化的斗争，学校与科举之争、新学与旧学之争、西学与中学之争都带有这种性质。资产阶级在领导文化变革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，并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能够站在时代前列、代表中华民族“讲话”、“呐喊”的思想家。可是，他们无力战胜帝国主义文化和中国封建文化的反动同盟：中国资产阶级文化革命同其政治革命一样，始终未能彻底完成。“五四”以后，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，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登上政治舞台，中国文化格局发生了变化，以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为

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，联合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作为同盟军，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主义文化展开了英勇进攻。

其基本态势是：其一，“五四”以后的30年，是中国社会的剧烈变革时期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逐步取得胜利的时期，与此相应，这个时期的中国文化仍围绕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主题，以传播、应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主潮，以介绍和品评西方文化、重释和阐扬中国传统文化为重要内容，并以文化为武器来推动社会改革、人民革命和民族解放为根本目的。其主要成就，不仅表现在文化各领域、各门学科的变革与发展上，而且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、应用以及弘扬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上。其二，这一时期中国文化界出现了派别林立论战迭起的复杂局面。其中影响较大的论争有：东西文化之争、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论争、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和关于中国文化出路的论争等，这是当时多种社会经济与复杂阶级关系、民族矛盾在文化形态上的反映，也是古今中西文化之争与多种思想源流汇集于中国社会的必然表现。其三，就文化的主要类型及其发展趋势看：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，代表着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；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，作为新文化营垒的一翼，继续发挥反帝反封建、推进社会前进的作用；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主义文化虽然占据统治地位，但是日薄西山，气息奄奄。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，在思想文化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，也是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伟大胜利，是帝国主义奴化思想和封建旧文化在中国的失败和破产。这是一个总的发展趋势，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，中国文化的发展和演变各有其不同的历史特点。

具体到各个学科，几乎每个学科都有一批学术大家在辛勤耕耘，都有一批学术著作相继面世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中国具有现代意义的、门类齐全的学科体系正是在这一时期建构起来的。例如在历史学学科，1939年开明书店出版了周谷诚的《中国通史》，1940年开明书店出版了吕思勉的

《中国通史》，1949年三联书店出版了吕振羽的《简明中国通史》，1948年新知识书局出版了侯外庐的《中国古代社会史》，194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周谷诚的《世界通史》，1936年南京文化印刷社出版了吕振羽的《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》，194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李源澄的《秦汉史》，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王钟麒的《三国史略》，1948年开明书店出版了吕思勉的《两晋南北朝史》，194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陈寅恪的《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》，194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金毓黻的《宋辽金史》，1947年上海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了孟森的《清史讲义》，1947年新华晋绥分店出版了范文澜的《中国近代史》，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罗尔纲的《太平天国史纲》，等等。这些学术巨匠和学术巨作，使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学学科正式建立起来了。其他学科如哲学、文学、教育学、民俗学、法学、图书馆学、博物馆学、考古学等，也是如此。学术史是全息。后来者应该探源开流，继往创新，把我国的学术研究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。

大概正是基于上述原因，我组织同仁历时数载，编辑出版了这套《中国学术文化名著文库》，以飨读者。

是为序。

胡 维 第

2011年12月15日

于长春百汇街寓所

编 前 语

—

教育史之内容，包括实际与理论两方面。教育制度、教育实施状况及教育者生活等等，属于实际方面。政府的教育宗旨、学者的教育学说及时代的教育思潮等等，属于理论方面。但只将以上所举的实际与理论两方面情形，原原本本，按照时代先后，叙述一个明白，还不足以完了研究教育史者的任务。研究教育史者的任务：第一，在于说明历代教育制度及学说之变迁的原因；第二，在于比较各时代、各地方的教育之异同与升降；第三，则在于阐发教育与政治经济的关系及统治阶级对于教育之如何利用；第四，尤在于以客观的态度批评历代教育之得失，并标明其特异之点。能够将以上所提示的种种方面，作一个有系统的叙述，以备今后研究教育者应取何种途径的一个南针，方可以成就一部教育史。

人类社会的意识，是随着经济发展的程度而前进，也是随着经济发展的形式而变迁，故一切意识形态莫不以经济为基础。教育属于意识形态的一种，也是建筑在经济基础之上。它是社会的产物，不是与生俱来的，某一种教育思潮之风起，必有当时的社会情形为背景；某一种教育制度之制定，必有当时的经济组织为基础。离开了社会及社会里面的经济组织，则无所谓教育，即无所谓教育史。故研究某一地方的教育，必要对于该地方

的社会情形及经济组织，有一个相当的了解；研究某一时代的教育，也必要对于该时代的社会情形及经济组织，有一个相当的了解。

教育目的随时代而变迁。原始公有时代，教育只有生物欲的目的——维持个体，保存种族。私有财产发生以后，除了生物欲的目的外，还有以教育为阶级支配的工具之目的。原始公有时代，没有正式的文字，没有分工的制度，社会也没有阶级性，教育与劳动是一致的，凡成年人都是教师，凡儿童都是学生。私有财产制度发生以后，文字也发明了，分工制度也有了，统治阶级也发生了；于是教育与劳动从此分家，教育的意义也就变更了。此时能够受教育的只限于少数人，教育权操在更少数人的手中——统治阶级的手中。私产制度时代，又分封建与资本主义两个阶段。在封建时代，统治者以培养忠顺的治术人才为宗旨，所以特别注意于道德的训练。在资本主义时代，统治者以培养机械的技术人才为宗旨，所以施行强迫教育，传授机械的工业技能，以增加其劳动效率。我们研究教育史，对于社会之历史演进的阶段，尤当鉴别清楚。

有了统治阶级，社会就有政治的形态。自统治阶级发生以后，教育与政治即连合为一，且成为政治之一部分。统治者一方为政治首领，一方为教育长官，他们以特殊地位制定教育，以政治力量推行教育，故教育不过为施行政治之一种手段，即为统治国家之一种工具。教育效率之大小，与政治力量之强弱成正比例，而教育本身所具的力量确乎有限，自统治阶级观之，不过是一种傀儡而已。故不仅“教育万能说”纯属欺人之谈，即“教育神圣说”更是自欺之语，除了社会达到了真正平等或吾人所理想的大同时代，教育不会有纯洁意义的。在私产制度之下，教育学者的教育学说，其思想往往与当时政府的教育宗旨是一致的，因为他们比较是知识分子，知识分子多半是依附于支配阶级以图生存的。他们所倡的教育学说，纵令有时在积极方面没有明显地拥护支配者的论调，但在消极方面很少有与当局冲突的地方。除了社会发展到了某种程度，支配阶级的势力快要崩溃的时候，他们才敢于唱几句

高调。教育随政治为转移，研究教育史者对于这一点也要认识清楚。

二

研究中国教育史比较困难，研究中国古代教育史更觉困难。第一，中国古籍可靠性太少，纵令经清代学者辨别出许多真伪，怀疑之点至今还是时时发现。除几本真伪难分的古籍以外，虽有古物古器及甲骨文字等项可供我们参考的资料，但此项学业尚在极幼稚时期。第二，中国社会之演进的阶段，至今还没有定论。有的以封建社会始于夏、商；有的说始于西周；有的说始于东周，西周尚在氏族社会与封建社会中间一种过渡的奴隶社会。自秦、汉以至现在，有的说还在封建时代，有的说秦、汉以来已有资本主义发生。第三，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分期，在教育方面，很难定出一个适当的标准。我们不是研究民族史，当然不能以各民族势力的消长为标准；我们不是研究纯粹的学术史，也不能以各家学说互相起伏的情形为标准；至于以上古中古及近古近世等说作标准来分期，更无意识。对于第一个问题不解决，则教育史上没有可靠的材料；第二个问题不解决，则没有真实的背景；第三个问题不解决，则没有适当的编制。

中国数千年的历史，勿论政治如何嬗变，产业如何发展，外力如何侵入，各家各派的学说如何纷争与起伏，而中国民族思想，自西周以至最近二十年前，总是以儒家思想为中心；所以他们所表现的性格或浅或深，大半是受过了儒家学说的几番洗礼无可疑的。不过自“五四”运动以来，中国民族的思想才有很大的变化。儒家思想，虽说祖述尧、舜，为中国民族相传相衍的习惯生活，其实是封建时代的产物，完全建筑在农村经济基础之上。自东西交通以来，帝国主义者的资本侵入到中国腹地，使中国农村经济发生很大的变化——由衰落而崩溃，由崩溃而破产；最近，全国经济的重心已由农村而移转到几个沿江沿海的大都市了。社会形态及经济组织

——发生变迁，则建筑在昔日社会基础之上的中心思想自然也必发生动摇与倒闭。反过来说，由中心思想的动摇与倒闭，即可以证明中国社会到近代确已进于资本主义的阶段。

所以在编辑中国教育史以前，我们应当有两个假定。第一，假定商代以前，为氏族社会，西周时代，为典型的封建社会，自秦、汉以至清代后期，为变形的封建社会——半封建社会；最近六十年以来，为初期的资本主义社会。各时代的社会形态及经济组织既然不同，以此为基础所产生的各时代的教育当然也是各别。第二，假定在氏族社会，为儒家思想的前生时期；在封建社会，为儒家思想的形成时期；在半封建社会，为儒家思想的流传时期；最近六十年以来，为儒家思想的动摇时期；自国民党改组以来，则为孙中山学说的支配时期。孙中山学说是以儒家思想为骨体，以欧、美诸社会学家的学说为资料，以中国目前社会及现代国际情形为背景，融合贯通而构成的三民主义。三民主义虽以儒家思想为骨体，但不是封建的，它是世界大同的，故孙中山平日对于儒家宗主孔子的大同思想极力倡道。简单一句话，中国民族思想，几千年以来，受了儒家思想的支配，至今尚未完全去掉。儒家思想以伦理为中心。他们的伦理学说，对于自身修养方面，取听天由命主义；对于社会秩序方面，取正名定分主义；对于论断事理方面，取折中调和主义。教育是告吾人以做人的方法，伦理是告吾人以做人的标准，故伦理学说也可以说就是教育的方针；研究中国教育史，而忽略了儒家思想支配中国社会数千年的势力，一定要失掉了史的可靠性，此层也是应当我们注意的。

三

在商代以前，完全为氏族社会，当然没有学校的形式；即在西周时代，后儒所盛称的教育如何发达，学校如何完备，我们也只当着一种附

会，绝非信史。中国最早的学校有信史可考的，应始于西汉武帝元朔年间，距今不过二千零五十年。但这不过是学校的启蒙时期，只具雏形，尚无制度，再过一百二十年，到平帝元始三年，始有学校制度的产生。此时虽有学校制度，不过在中央有太学，在地方有学、校、庠、序等名称，一切尚极简单。在魏、晋六朝，不仅学校教育没有进步，且因政局混乱与长期战争，学校有名无实——时常陷于停顿状态。到了唐朝，学校教育于是突飞猛进：有了一定的系统，有了各样的科目，有了严格的考课，有了固定的假期，凡学生年龄，资格及入学手续皆有明显的规定。到了宋朝，更有明显的等级，及积分法的施行。但这些法子，多注意在中央的各种学校。到了明、清两朝，凡地方学校也有考课了。不过明、清地方学校虽有考课的规定，而当时社会人士群相趋赴于科举一途，学校徒有其名；且中央也只有属于文科的国子学，比较唐、宋两朝各科具备的相差多了。关于教育行政方面，两汉尚没有专设的机关，中央太学只由太常兼管，地方各学只由郡县长官兼管。到了唐、宋，中央各学大概统于国子监，地方各学，唐朝统于长史，宋朝统于提举学事司。明、清两朝与唐、宋大致相同：中央太学即国子监，地方各学统于提学使司。我们总结起来：在周代以前，尚没有信史可考，后儒所附会的一番话，暂时只有存而不论。自此以后，学校教育，在两汉为启蒙时期，在魏、晋、六朝为停顿时期，在唐、宋两代为发达时期，在元、明、清三朝为衰落时期。

君主专制时代，以培养治术人才为宗旨，所以政府所设施只有成人教育。我们以上所说，全是关于成人教育的，不过内中分有高中两等：凡中央各专门大学均属于高等性质，凡地方各项儒学皆属于中等性质。自唐宋以来，在政府方面虽也曾设立过小学，不过稍为点缀，且多半为皇室及官宦子孙特别开设，于一般民众是关系极少的，民众的初等教育只有让民众自己想法子。

中国旧式教育，学校与科举是相终始的。我们把科举的历史可以分着三个时期：（1）汉、魏、六朝为科举的萌芽时期。（2）唐、宋两代为科

举的兴起时期。(3)明、清两代为科举的极盛时期。科举制度到后来虽日趋复杂,总不外常科与特科两类。两汉选举“孝廉秀才”,就是唐、宋以来的常科;选举“贤良方正”,就是唐、宋以来的特科。关于选举的手续,西汉只有对策一项;到了东汉,还须经过一次文字的考试——这完全是科举的雏形了。不过此时尚没有烦琐的制度及严密的考试,其制度与考试法到隋、唐以后才完全规定出来,所以一般人皆以为科举创始于隋之大业年间,确是一种错误。唐、宋两代,虽制定了完备的制度,政府对于学校教育还是比较注重。到了明、清两朝,则学校轻而科举重,当时国家全部教育差不多为科举所垄断,政府以此类奖励,社会人士趋之若鹜,于是学校等于虚设,名存而实亡了。由此看来,中国有了学校就有科举,有了学校制度就有科举制度,二千年的教育制度史就是一部科举制度史。

科举是什么?自一方面说,它是录取人才的考试制度,发给学位的甄别试验。自又一方面说,它是俗人加入丛林的戒法,自由民加入士族阶级的方式。获取了科举资格以后,即能享受种种特权:(1)免除差役,(2)地方衙门以宾礼相待,(3)在社会常居优越的地位,(4)有掌握国家政治大权的希望,(5)如已做了大官,被目为正流清流,否则为杂流浊流。因为有种种特权,所以业已入了丛林的,牢守其特殊地位始终不肯放弃;未曾加入的,殚毕生的精力,拼命趋赴,希求加入以为荣宠。由此看来,科举完全是半封建时代的产物,它在中国教育史上差不多横行了二千年,一直到了清王朝快要灭亡的时候,才把它取消;更可以证明自清代以前,中国社会几千年还停滞在半封建时代。

在隋、唐以前,中国学者讲学,多半在他自己的家里设帐,或在侯王的府第里设帐。自宋代以后,他们讲学多在书院里面。书院产生于五代之末,到了宋朝,因理学家蔚然兴起,于是此事大盛。由元而明,由明而清,这三朝对于书院的设立,更其广遍了。但书院在当初,不过为私人自由讲学聚集门徒的场所,迨后政府渐渐注意,渐渐改由官办,到了清朝,简直视为各省

高等学校，而形成一种教育制度——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点特色。

中国学者所研究的方向各代不同。东周为民族思想的成熟时期，又为社会组织的剧变时期，所以当时学者多半注意在解决当时社会问题，对于学术的贡献在创造。两汉学者生在秦火之后，昔贤所流传的古籍多半残缺不全了，所以他们毕生的精力全用之于古籍的搜集与整理，对于学术的贡献在考据。考据工作过于机械时，遂发生一种反动的学风，且因国家长期的纷乱，所以魏晋学者注精力于老、庄的复活，南北朝学者注精力于佛学的输入。佛学到了唐朝已入于成熟时期，他们又专门用力于佛学的整理与组织。到了宋朝，儒、道、佛三家学说有融和的趋势，所以宋、元、明三朝六七百年，一般学者专在用力于形而上学的研究。清初尚有此种余风，不久又发生一种反趋势，一般硕学皆以考证学著称了。此处所谓形而上学，多指性理学说的。不过宋儒所讲，把性与心分开，性也有两种，近于二元论；明儒所讲，把性与心合一，性只有一个，近于一元论——是愈趋愈玄了。

统治阶级对于牢笼士族阶级的法术，历代不同，所以各代想做官的士子们所用力的途径也不一样。两汉政府以家法取士，士子们所以谨守家法；唐朝政府以诗赋取士，士子们所以用力诗赋；宋朝政府以经义取士，士子们所以日读三经新义；明、清两朝以八股取士，士子们所以专攻八股。家法、诗赋、经义及八股，勿论何种，全是消磨人类精神的利器，于教育本身是很少价值的。

中国史上的教育家，分汉学与宋学两派。汉学派以读书为目的，宋学派以修己为目的。汉学派以古籍为研究的对象，只研究古籍之真伪，行为又是一个问题，对于人生行为的好坏与他所学所教的毫无关系。宋学派以自己为研究的对象，他们平日所研究的方法就是怎样做人，所研究的目标就是做一个什么人。换一句话，他们一方研究，一方实行，一方又体验，以知识指导其行为，从行为以证实其知识，谓之实践主义。所以我们称前者为记诵主义的教育家，称后者为实践主义的教育家；凡汉、唐、清三朝